

【历史研究】

戚继光籍贯新探

秦进才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91)

摘要:戚继光的籍贯,在《明史》中没有详细的记载,在明清文献中有着多种不同的表述,现代人看法也不一致。根据大量相关传世文献与新发现的碑刻等史料,戚继光籍贯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凤阳定远人,山东登州卫籍,其他各种说法均由此衍生而成。戚继光是明朝祖籍、卫籍双籍并存现象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戚继光;籍贯;军籍;新探

中图分类号: K 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87(2009)06-0126-08

《明史》载:“戚继光,字元敬,世登州卫指挥僉事。”^{[1](P5610)}记载了世袭之职,未记述籍贯之地。戚祚国纂《戚少保年谱耆编》称:“家严讳继光,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世家东牟,官卫尉,而为东海氏焉。考自始祖详,当元末时,从外氏避乱濠梁,居定远之昌义乡。”^{[2](P1)}把戚继光家族世代居住与祖宗发迹之地交代得很清楚。东牟今属山东,定远今属安徽。因此,熊明陶、王正权等人申述定远说¹,郝子文、周恩惠主张蓬莱说^④。此外,还有人认为戚继光祖籍是江西赣县湖江^④,也有戚继光远祖籍贯的其他说法^{1/4}。其实,戚继光之父曾言:“先世故姓倪,载在勋府”^{1/2}。其祖先姓倪而非姓戚,故所谓戚继光远祖之说不可信。戚继光籍贯,是一个从明清以来记载分歧,至今尚争论纷纭而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安徽定远与山东蓬莱两说相争。笔者根据传世文献与燕赵之地近年来发现的长城纪事碑刻和明朝户籍与军籍制度,试对戚继光籍贯作新的探讨。

一、戚继光自己的籍贯说法

古人的籍贯,不仅是祖籍、原籍、故里、居住地、人生的标志等,而且与政治、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南阳人刘秀中兴汉室,出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3](P781)}的格局,凤阳人朱元璋创建明朝,形成“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4](第1232册P451)}的局面,籍贯成为官场飞黄腾达的重要因素。宋代的洛党、蜀党、朔党等政治派别,以领袖籍贯为名称;关学、洛学、闽学等学术流派,也以代表人物籍贯为标志。但是很多历史人物的籍贯,不仅史志、文集等记载多有不同,各地争论纷纭,而且本人在不同场合有着不同的说法,戚继光有时自称蓬莱人,有时自称凤阳、定远人。

自称蓬莱人。戚继光自称:“光,东牟竖子也。”^{[5](P204)}“余食封东牟,祖先所留具在。”^{[5](P137)}“吾世东牟,今七叶矣”^{[2](P16)}。“余故里山东蓬莱阁。”^{[5](P119)}“以岁乙酉冬,始生还故里”^{[2](P419)}。亦自

收稿日期: 2009-06-28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燕赵历史人物研究(项目批准号: H B08BLS001)

作者简介: 秦进才(1953-),男,河北衡水人,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秦汉史和历史文献研究。

言：“继光，东海竖子也。”^{[5](P209)} 诗言：“倏奉天王命，分符东海头。怒发凌齐飙，壮图指吴钩。弹冠桑梓间，父老慰且酬。”^{[5](P26)} 又说：“岁癸丑，以夷警擢督备倭山东，起积队于故里。”^{[2](P417)} 指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年）奉命督山东备倭。称“东海”、“山东”为“桑梓”，为“故里”。戚继光自称籍贯有山东、东牟、蓬莱、东海等不同名称，这与蓬莱的行政区划沿革有关。汉武帝驾至东莱（治今山东莱州），临大海，望祠蓬莱，筑蓬莱城。唐贞观八年（634年），设蓬莱镇。神龙三年（707年），改黄县为蓬莱县，登州治所由牟平迁至蓬莱。天宝元年（742年），改登州为东牟郡，乾元元年（758年），复改为登州，宋金元沿袭其名。洪武九年（1376年），升为登州府。因此，登州、东牟、蓬莱，既有地名前后相承的联系，也有州郡府与县的隶属关系，还有从唐神龙到明蓬莱一直是州、府、县治所的原因。明朝山东无东牟县，戚继光所说东牟，当指唐代东牟郡而言。蓬莱阁，是蓬莱的标志性建筑，代指蓬莱。地处山东半岛北岸的蓬莱岬与辽东半岛南端老铁口的连线，是渤海、黄海的分界线，渤海、黄海，秦汉以后泛称为东海。戚继光称东海亦是指蓬莱而言，居住在蓬莱的戚继光家族是戚姓的东海氏。

戚继光家族自明初迁徙到山东都司登州卫，世袭卫指挥僉事。登州卫指挥使司驻在登州府治所蓬莱，戚家居住生活已经有六代之久，至今尚有戚家牌坊、宅第、祠堂、坟墓等在此，戚继光上述自称确有道理。蓬莱也以戚继光作为自己的骄傲，戚家的宅第、祠堂、坟墓等已经成为蓬莱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旅游资源，也成为论证戚继光籍贯蓬莱的根据。

自称凤阳人。主要资料是戚继光主持修筑蓟镇长城时遗留下来的纪事碑刻。笔者目前所见有三种职衔名称方式。一是“总理练兵兼镇守蓟州等处地方总兵官中军都督府右都督凤阳戚继光”，如河北青龙县擦崖子口隆庆三年（1569年）孟夏长城题名碑^{[6](P1020)}，天津市黄崖关隆庆四年（1570年）春修建空心敌台碑等⁷，河北抚宁县河口隆庆四年仲夏长城筑城纪事碑等^{[7](P192)}，抚宁县驻操营镇大尖洼村万历年元（1573年）九月纪事碑^{[8](卷九P191、192)}，河北青龙县石义窟窿山万历年元九月长城纪事碑刻^{[6](P1014)}等。二是“总理练兵兼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总兵官中军都督府右都督凤阳戚继光”，如河北迁安县白羊峪口隆庆五年（1571年）长城记事碑^{[9](P75)}。三是“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总兵官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凤阳戚继光”，如抚宁县大

尖洼村万历五年（1577年）纪事碑，董家口段扁楼碑^{[8](P192、194)}，青龙县石义窟窿山万历年季秋长城纪事碑刻^⑧，抚宁县仲夏长城记事碑等^{[10](P511)}（七）。《明史·戚继光传》载：“自嘉靖以来，边墙虽修，墩台未建。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因地制宜，修成精坚雄壮、声势联接的蓟镇长城。这些长城纪事碑刻，是戚继光督修长城的记录，既证明戚继光“在蓟也，足竭穷荒，心竭智虑，无一楼垣非亲自持筹而步算，无一戈櫓非亲自检点而试验者也”^{[2](P422)}的说法可信，又具体说明戚继光“相视险阻，历羊肠鸟道之艰；督理工程，甘栉风沐雨之苦”^{[2](P313)}的过程，还可以起到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作用，使史志文献笼统的记载变得具体，更是近年来考察长城的新发现，为研究戚继光生平与籍贯提供了新资料。

自称定远人。既有传世文献资料的记载，又有新发现碑刻史料的佐证，资料数量多而种类比较丰富，笔者归纳目前所见资料，可分为五种职衔名称形式。一是“总理练兵兼镇守蓟州等处地方总兵官中军都督府右都督定远戚继光”，如北京市密云县隆庆四年（1570年）夏与隆庆五年孟夏司马台城志等^{[11](P576)}。二是“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总兵官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定远戚继光”，如河北青龙县刘家口万历六年（1578年）重建刘家口关长城纪事碑刻^⑨，河北卢龙县刘家营乡刘家口村万历六年长城纪事碑等^{[8](P192)}。三是“特进光禄大夫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奉敕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前福浙江广神威营总兵官定远戚继光”，如万历丁丑（五年，1577年）三月重建三屯营镇府记碑等^{[12](P589)}。四是“钦差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地方总兵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定远戚继光”，如河北遵化市马兰峪永旺塔万历十年（1584年）仲秋匾记^{[13](P46)}。五是“特进光禄大夫左都督总理蓟镇定远戚继光”，如河北遵化市侯家寨乡禅林寺村的戚继光登舍身台诗碑^{[14](P93)}。职衔名称不同的原因，一是与时间不同，所担任的官职不同有关^⑩。二是有时候用官职简称，有时候把官职、加官、虚衔、阶官等全写上。还有不带职衔名号而称“定远戚继光”者，如《纪效新书·自序》署名；再如北京市密云县龙泉寺万历三年（1575年）碑刻¹¹，安徽休宁县齐云山万历十三年（1585年）摩崖石刻¹²，河北抚宁县天马山摩崖石刻¹³。这些石刻纪事碑等，有的带有职衔名称、籍贯等因素，有的仅题“定远戚继光”，主要是因为场合与

身份角色不同,在巡阅边关要塞督修长城时把职衔、籍贯等写上,以说明所担负的职责,并标示其社会地位、官职高低与家族声望等,而在游览时则不必如此讲究了。有时也不写籍贯,如河北滦平县金山岭长城库房楼外侧支墙上有隆庆四年(1570年)夏纪事碑载“总理练兵兼镇守蓟州等地方总兵官中军都督右都督戚继光,山东春班都司戚继美”^[14],兄弟两人都没有注明籍贯。

明朝凤阳府、定远县,两者有府与县上下级隶属关系,对人的籍贯记载来说有具体与宽泛笼统之别。凤阳,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故乡,曾在此建造中都。定远县,不仅是明初丞相李善长、胡惟庸,开国功臣徐达、沐英、蓝玉、胡大海、华云龙等人的故里,而且涌现出一大批开国将士,笔者据嘉靖《定远县志》卷五《人物·武臣》统计,仅戚继光祖宗发迹之地的定远县昌义乡就有千户以上军官五十五人。中国人有着恋乡土的情怀,有寻根认祖的传统,有以祖先为荣的情结,作为明朝开国将士后裔的戚继光自称为凤阳、定远人,并以此为荣,也是理所当然的。不仅戚继光如此,而且这也是明朝政府规定^[15]与卫所军官记载籍贯的习惯方式,如嘉靖《临山卫志》,记载其指挥使、指挥僉事、千户等一百零六位军官的乡贯与世系^[15](《华中地方第564号P30-44》)。康熙《天津卫志》虽因“卫今多废,弁似不必复记姓名。但文武考试必取据甘结,为官为军、某屯某所,则当年远调来津立城定赋,其来历不容混也”,故在《户口》门设《官籍》记载卫所军官二百余人的乡贯^[16](《华北地方第141号P93-98》)。《靖海卫志》也记载了明朝靖海卫指挥使、指挥同知、千户、百户等军官的乡贯^[17](《华北地方第3号P19-24》)。此类记载为数不少。

戚继光自称为登州蓬莱、凤阳、定远人等,所说地名,既有明朝使用的地名凤阳、定远、山东、蓬莱等,又有古代的地名东牟,还有泛称的东海等,体现出其具有武将的风度,也带着文人的儒雅。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蓬莱戚氏的发家史有关,也与戚继光的文化素养、身份角色等有关,更与明朝的户籍和军籍制度密切相连。

二、明朝户籍、军籍制度与戚继光籍贯

籍贯,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也有着不同的籍贯观念。先秦时代人物乡里多未详细记载,如《史记·荀卿列传》称:“荀卿,赵人”,似乎有失宽泛笼统。汉朝人注重著籍地,著籍地变更籍贯也随之变化,如鲍宣,《汉书·鲍宣传》记载为渤海高城(治

今河北盐山东南故城)人,迁徙到上党郡长子县后,人称为“上党鲍宣”^[16]。其子鲍永,《后汉书·鲍永列传》记载为上党屯留(治今山西屯留古城)人。其九世孙鲍勋,《三国志·鲍勋传》记载为泰山平阳(治今山东新泰)人。父子、后裔籍贯相异是著籍地不同使然。东晋南朝时,“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吴、越之乡,州编冀、豫”。不仅地名随人迁移,而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18](P144)。受九品中正制的影响,郡望成为家族身份的标志,代表着社会地位,成为选官与待遇享受的依据,直接与政治、经济利益挂钩,又影响其家族地位与仕宦命运,形成了南北朝隋唐时代士大夫注重郡望的观念。王曰琅琊,卢说范阳,李标赵郡、陇西,崔称清河、博陵等。唐朝中期以后,“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士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19](P3843-3844)。郡望逐渐转化为姓望。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20](P1)。宋朝“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21](第183册卷35P7)。苏轼,自称眉山苏轼,又署名赵郡苏轼,前者是著籍地,后者是祖籍地。

明朝人的籍贯观念也有些变化,王毓铨认为:籍,原是册籍,人户册籍就是户籍,籍上注有应役人丁的姓名,所以又可称之为名籍。贯,指的是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他的户役籍所在地^[22](P787-788)。他把籍贯一分为二,包括户籍与乡贯两种内涵。实际上,明代户籍中有乡贯的记载,洪武三年(1370年),颁发户帖,户帖有乡贯、役籍、事产等内容。政府据此编制户籍,按民、军、匠等籍分别收藏于户、兵、工部,户帖交给本户。洪武十四年(1381年),在户帖基础上推出记载每户人口、乡贯、役籍、财产状况等内容的黄册。“民以此定其籍贯,官按此以为科差。……版籍既定,户口之或多或少,物力之或有或无,披阅之顷,一目可尽。官府遇有科差,按籍而注之,无不当而均矣。”^[23](第714册P408)户籍制度成为政府了解人数事产情况,用以控制人口、征收赋税、征发徭役的措施,也为籍贯研究提供了资料。人户以籍为定,役皆永充,“凡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籍为定。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其官司妄准脱免及变乱板籍者,罪同”^[24](第618册P611-612)。户籍中的军、民、匠、灶等户别,每种还分为多少不等的籍别,如民户分为儒、医、富户等籍,军户分为军匠、勇士、军校、校尉等籍,以表明不同户籍、籍别对国家担负的特定赋役^[17]。

军户称谓,自南朝刘宋时出现,历代内涵不尽相同,各朝又自有特点,元朝时,“天下之兵,户籍伍符,永为定制,不能更易焉”^{[25](P461)}。明朝沿袭元代制度,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秋,“令卫所著军士姓名、乡贯为籍,具载丁口,以便取补。又置军籍勘合,分给内外,军士遇点阅以为验”^{[1](P2255)}。军户的户籍称为“军籍”、“戍籍”、“戎籍”,又称为“尺籍”、“伍符”、“赤籍”等。还规定“户有军籍,必仕至兵部尚书始得除”^{[1](P2258)}。军户脱籍的条件是丁尽户绝、丁尽户存等。豁免军籍,要由皇帝批准¹⁸。同时,规定“凡军、匠、灶户,役皆永充。军户死若逃者,于原籍勾补”^{[1](P1906)}。管理严密,“军士应起解者,皆立妻,有津给军装、解军行粮、军丁口粮之费。其册单编造,皆有恒式。初定户口、收军、勾清三册”^{[1](P2258)}。户口册,是军士原籍州县编造的军户户籍册。收军册,是记载卫所编制与军士数额的籍册。清勾册,是记录军士逃亡死故情况的簿册。遇有军士缺额,就可按册勾丁补充。当然,这些都是制度规定,与实际情况还会有些差别,执行起来也未必如此标准而不走样。

明代军户或军籍有两种不同形式。

其一是州县军户,指府州县等行政系统所管辖的军籍人口,主要包括卫所军人在州县原籍的家族成员和卫所正军的贴户等¹⁹。“军士以卫所为家,父母兄弟在焉;州县为老家,族姓在焉。”^{[26](P2927)}“户三丁以上垛正军一名,别有贴户,正军病死,贴户丁补役。”^{[27](P80)}其主要职责是递补卫所正军的缺额、部分资助正军生理,平时与民户一样,承担政府规定的赋役,这就是史志中的军、民、匠、灶等户别之一。“凡军之家,原有一支当军他卫,每数十年归宗勒取军装,大户尝派二三百,小户百两不等。”^{[28](第1301册P407)}如果卫所军人“有逃故,按籍勾补。”“朝廷岁遣御史清军,有缺必补。每当勾丁,逮捕族属、里长,延及他甲,鸡犬为之不宁”^{[1](P2301)}。牵涉之广、负担之重可想而知。

其二是卫所军户,亦称卫籍²⁰,是明代卫所制度下形成的一种带有军事性质的户籍。明初确立卫所制时,要求驻扎在卫所的军官和正军都要把妻、子等家属迁来合聚,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结构。同时划出一定区域归卫所管辖,并按各地不同情况拨给数量不等的屯田、马场、桑枣园等,供卫所使用。这就为卫所军人的繁衍承袭提供了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卫所主要是由军官与正军构成的情况发生变化。有些正军不堪忍受军官的压榨、卫所驻地生活环境

的恶劣而逃亡、脱籍或死亡,或者没有男丁可继承而出现缺额。有些卫所军官、士兵后裔不断增加,除一般由长子袭替外,次子以下成为舍余,繁殖成为越来越多的小家庭。这可用卫籍来概括卫所人口。一般情况下卫籍人的生活与州县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异²¹。

以上两种军户或军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对明朝大多数人来讲,户籍所在地,既是祖居地,又是出生地,一般意义上讲的明朝人籍贯、乡贯、本籍、本贯等,就是户籍,即户帖、黄册上登记的地址^{[29](P313)}。但上述两种相互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军籍制度,导致了卫所军户既有州县祖籍(乡贯),又有卫所军籍,如何塘自称:“系河南怀庆卫军籍,直隶扬州府泰州如皋县人。”^{[30](第1270册P520)}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卷五十《兵部尚书》等表,既记卫籍,又注乡贯,如王竑,陕西河州卫籍,湖广江夏人;王敞,浙江西安人,南京锦衣卫籍;范鏊,江西乐平人,辽东沈阳卫籍;徐琦,陕西宁夏卫籍,浙江钱塘人;王軌,万全开平卫籍,直隶江都人。科举考试中,有些人也将卫籍与乡贯注明,如《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所载的金铉,留守前卫籍,直隶武进人,崇祯戊辰进士;周金,南京府军右卫籍,直隶武进人,正德戊辰进士;李本纬,锦衣卫籍,山西曲沃人,万历壬辰进士。沈登苗认为:既有户籍(现籍),又有乡贯(祖籍)的明代进士是“双籍进士”。他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明代有双籍进士二千八百二十一人,占进士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三七^{[29](P313-316)}。既有双籍进士,也就有双籍官员、双籍将士等。双籍将士与有些双籍进士不同,在于既有卫籍,又有祖籍(乡贯)。笔者粗略检阅《明史》列传,既有乡贯又有卫籍的人物有一百零九人,这只是计算有专传者,尚未计算祖宗立功取得世袭军职、以及子孙荫袭者人数在内,再则进入《明史》记载者是极少的一部分,实际上更多的双籍将士未在《明史》中记载²²。除《明史》明确记载乡贯、卫籍并存者外,有卫籍者有的亦有乡贯,如《明史·刘济传》载:刘济,腾骧卫人。《掖垣人鉴》卷十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载:刘济,腾骧右卫籍,陕西蓝田县人。陕西蓝田县是其乡贯所在,腾骧右卫则是其军籍所在。再如《明史·何腾蛟传》载:“何腾蛟,字云从,贵州黎平卫人。”张岱说:“何腾蛟,字云从,贵州黎平人,浙江山阴籍。”^{[31](P269)}可知贵州黎平是何腾蛟卫籍所在,浙江山阴是其乡贯所在。有看似乡贯实际上是卫籍者,如《明史·杨嗣昌传》载:“杨嗣昌,字文弱,武陵人。”似乎是乡贯,但杨嗣

昌自称：“臣原籍建平，伍符隶常德卫。”^{[32](P406)}《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作：杨嗣昌，湖广常德卫。可见其祖籍是南直隶建平县（治今安徽郎溪建平镇），卫籍是湖南都司常德卫，驻扎于常德府武陵县，故称武陵人。本是卫籍，被后人视为乡贯。有乡贯、军职者有的还有卫籍，如《明史·任礼传》载：“任礼，字尚义，临漳人。以燕山卫卒从成祖起兵，积功至山东都指挥使。”未记载其卫籍，并不等于没有，《明实录·明宪宗实录》卷十三成化元年正月辛未载：任礼“河南临漳县人，洪武末，隶籍大兴卫。”诸如此类的人不胜枚举。

祖籍（乡贯）、卫籍双籍并存人物的籍贯归属类型多种多样。除上述文献中所记载的祖籍（乡贯）、卫籍双籍并存者外，有些人的卫籍转化成了乡贯，如《明史·朱之冯传》载：“朱之冯，字乐三，大兴人。”张岱言：“朱之冯，顺天大兴籍，南直徐州人；天启乙丑进士。”^{[31](P125)}可知大兴是卫籍，而变成了乡贯。再如《明史·彭泽传》载：“彭泽，字济物，兰州人。”刘耕说：彭泽“兰州卫人”^{[33](P1579)}。陈洪谟称：“彭泽，陕西兰州卫人也。”^{[34](第433册P339)}王世贞说：“彭泽，陕西兰州卫籍，湖广长沙人。”²³可见，彭泽卫籍是兰州卫，乡贯是湖广长沙。彭泽自称：“关中彭泽”^{[35](下册P152、164)}，即陕西人，认同卫籍为乡贯。《明史·彭泽传》把卫籍当成了乡贯，明朝有些人还能区别彭泽的乡贯与卫籍，而到清朝著述多数都记载彭泽是兰州人了。有些人在卫所驻地安家落户，逐渐转化成土著，因此有以卫所驻地著称者。如《明史·海瑞传》载：“海瑞，字汝贤，琼山人。”黄秉石称：“公讳瑞，字汝贤。广东南海卫籍，番禺人，而世居于琼山。”^{[36](P549)}梁云龙说：“公讳瑞，字汝贤，其上世以来未详。在国初以军功世广州卫指挥某者，隶籍番禺，今为番禺人。洪武十六年，答儿从军海南，著姓于琼，遂为琼山人。”^{[36](P533)}琼山是海瑞家族卫籍所在，又是世居之地，因此称海瑞为海琼山。有些人由卫所驻地回到了原籍故里，恢复了原来的籍贯。如程信，原籍南直隶休宁（治今安徽休宁海阳镇），祖程杜寿洪武末谪戍河间，遂居为家，隶“河间沈阳中屯卫籍”²⁴。程信生于河间，正统七年（1442年）中进士，成化三年（1467年）升任兵部尚书，成化十一年（1475年）“以疾乞归，居休宁”。回到了原籍休宁²⁵。后人又以休宁为其籍贯。《明史·杜桐传》载：“杜桐，字来仪，昆山人，徙延安卫”。后来其子孙“国变后，文焕父子归原籍昆山”。也有些人虽然回到了原籍，但依然以卫籍著称，如李梦阳，《明清进士

题名碑录索引》载：陕西庆阳卫籍，乡贯河南扶沟。早在其父李正为周府封丘王教授时就迁居开封，扶沟为河南开封府辖县，实际已经回归原籍。他以庆阳籍中陕西乡试弘治五年（1492年）第一名，以陕西庆阳卫籍中弘治六年进士，官至江西按察司副使，死后葬于钧州（治今河南禹州）大阳山，《明史·文苑传》记载为庆阳人，人称为庆阳李梦阳。还有些人虽未曾回归故里，但仍然以原籍著称，如《明史·李东阳传》载：“李东阳，字宾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师。”李东阳自称：“臣原籍系湖广长沙府茶陵州人，金吾左右卫所军籍，在京住坐。”^{[37](第1250册P428)}杨一清撰《李公东阳墓志铭》称：李东阳“少居京师，先本湖广茶陵人，国朝洪武初，以戎籍隶燕山左护卫，后改金吾左卫”^{[33](P469)}。因乡贯而世称李茶陵，以李东阳为代表的文学流派称为茶陵派。更有些人以乡贯、卫籍并存而著于史册，如史可法，《明史》本传载：“大兴籍，祥符人。”卫籍、乡贯双籍并存的人物不胜枚举，人生历程千姿百态，籍贯归属类型多种多样，为后人研究历史人物的籍贯归属提出了难题，为乡贯、卫籍所在地的籍贯之争埋下了伏笔，因此也成为明代历史人物籍贯的显著特点。后来随着明亡清兴撤卫所归府县，许多乡贯、卫籍双籍并存人物的后裔融入了实际居住地的社会生活当中，自然籍贯也就由双籍并存变为以居住地为籍贯，最终完成了从侨寓到土著的转变。

戚继光是明朝祖籍（乡贯）与卫籍双籍并存将领中的一个，凤阳府定远县，是他的祖籍（乡贯）所在，无论是戚继光挚友汪道昆的《太函集》卷二十七《孝廉将军传》，还是初刻于万历四年（1576年）的刘效祖《四镇三关志》卷九《才贤考·真保镇才贤·戚景通》与初版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李贽《续藏书》卷十四《勋封名臣·都司戚公》均载：戚景通，其先定远人，世袭登州卫指挥僉事。所以很多明朝人认为戚继光是定远人²⁶，戚继光也在许多公开场合自称“定远戚继光”或“凤阳戚继光”。山东都司登州卫是戚继光的卫籍所在，卫指挥僉事是戚家的世袭之职，几代人生于此，长于此，葬于此，已经落地生根，而且声名显赫。按照明朝人的思维模式与户籍、军籍制度准确地说戚继光籍贯应当是：凤阳定远人，山东登州卫籍²⁷。随着时间的推移，卫所军户与州县军户之间血缘关系越来越远，联系越来越少，逐渐地居住地与驻扎地重合，侨寓转化为土著，又因登州卫指挥使司驻在登州府城中，登州府治所在蓬莱县城，戚继光故以蓬莱人自称²⁸，亦被认为是登州

人²⁹。登州隶属于山东,因此,不仅戚继光自己认为是山东人,而且别人也有认为戚继光是山东人者³⁰。还有些人也将戚继光籍贯山东、定远并提³¹。戚继光祖籍(乡贯)、卫籍双籍并存的籍贯是明朝户籍与军籍制度所导致的,因此明清人所撰写的书籍文献中记载有山东、登州卫、登州、蓬莱、南直定远、定远等地的不同,有戚继光自称蓬莱、东牟、凤阳、定远等地的相异,其实都是有道理有根据的,只是记载角度不同,有宽泛与具体之分,有全面与片面之别。

三、结语

由上述可知,凤阳、定远,是戚继光的祖籍(乡贯)所在地,祖先兴起于此;登州、蓬莱,是戚继光的卫籍所在地,世代居住于此,两地都是戚继光自己所认同的籍贯。因此,戚继光在不同的场

合有不同的说法,事出有因,合乎情理,这是由戚继光家族发家史与其身份角色所导致的,也是由明朝户籍与军籍制度所造成的,是明朝带有相当普遍性的社会存在,决非只此一家,如与戚继光同在福建抗倭的俞大猷,乡贯晋江人,泉州卫籍,还有上文所列举的李东阳、史可法等人都可证。祖籍(乡贯)、卫籍双籍并存的人物,明朝历史文献中记载甚多,不见于记载的当会更多。时至今日,不必也不可能用现代的观念去规范古人的行为,不必也不能用当代的想象来代替明朝的事实,没有必要强求戚继光籍贯只能有一个,更不用为此事争个输赢高低,从尊重明朝历史和户籍与军籍制度的角度看,从尊重戚继光自己的感情来说,戚继光是祖籍(乡贯)、卫籍双籍并存的将军。

注 释:

¹ 定远县地方志编委会《定远县志》附录《戚继光是不是定远县人》(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957—959页)。今人持定远说者有:卢茂村《关于戚继光籍里考》(《南方文物》1985年,第2期),范中文《戚继光的祖籍与卒年》(《江淮论坛》1987年,第2期)。

^④ 《戚继光籍贯辨》,载阎崇年主编《戚继光研究论集》(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401—404页),又见山东省蓬莱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蓬莱县志》附录(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761—762页)。阎崇年《戚继光籍贯考》(《文史哲》1991年,第3期),也倾向于山东蓬莱说。

^④ 参见赣县博物馆《关于抗倭英雄戚继光祖籍的调查》(《南方文物》1984年,第2期),林晓平、戚莎莉《戚继光祖居地及远祖新证》(《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1/4} 董来喜《戚继光》载:戚继光远祖是河南卫辉府(今汲县)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1/2} 汪道昆《太函集》卷二七《孝廉将军传》(《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7册第125页)。参见李贽《续藏书》卷一四《勋封名臣·都司戚公传》(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93页);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七《南直隶凤阳府》(《续修四库全书》,第533册第354页)等。戚继光家如何由姓倪变为姓戚的过程,尚不清楚,但由姓倪变为姓戚则是客观存在。因为,这是戚景通推辞总督备倭的戚勋欲引为同姓时所言,如果祖先不姓倪而姓戚,为何拒绝戚勋的好意呢?更何况此事“载在勋府”。

^{1/4} 方放主编《天津黄崖关长城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此书还有两块残碑有“凤阳戚继光”题名,因职衔名称不全,故未列举。

^⑧ 胡广利主编《青龙满族自治县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4页)。“陈兵”当为“练兵”之误。

^(七) 此碑年代记载模糊不清,位置在城子峪口与董家口交界处。

^⑩ 《青龙满族自治县县志》,第1018页。原文著录为“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冀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总兵官中军都督府右都督定远戚继光”,“冀州”当是“蓟州”之误。

^⑤ 《明实录·明穆宗实录》卷三〇隆庆三年三月庚戌载:“升福建总兵戚继光右都督”(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49册第787页)。《明实录·明神宗实录》卷二万历二年正月辛卯载:“升薊镇总兵官戚继光实职一级为左都督”(第51册第567页)。因时间不同,官职变化,所以职衔不同。

¹¹ 《密云县志》第十七编《文化》载:万历三年(1575年)龙潭有序碑载:“万历乙亥冬十月之望定远戚继光书”。第575页。

¹² 阮移平《戚继光籍贯小考》载铭文:“定远戚继光同新都汪时元、邵正魁、汪道会游此,时万历乙酉八月既望。本山道官吴伯宁、胡日章立石”(《中国档案》1990年,第11期)。

¹³ 《抚宁县志》载“天马山”摩崖刻石,落款“定远戚继光题,范阳张爵刻”。第521页。摩崖刻石无年代记载,张爵从万历四年到八年驻守台头路,后为薊镇中路总兵,因此摩崖刻石的时间,当在张爵任职范围内。

¹⁴ 《河北长城游》,第195页。“中军都督右都督戚继光”当作“中军都督府右都督戚继光”,漏一“府”字。

¹⁵ 《明史》卷九二《兵四》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秋,“令卫所著军士姓名、乡贯为籍,具载丁口,以便取补”。第2255页。

¹⁶ 《汉书》卷八六《何武传》与卷八八《儒林传·林尊》均作:“上党鲍宣”(第3487、3604页)。与本传不同,当因鲍宣迁徙到上党。《后汉书》对鲍宣籍贯记载也不一致,卷二五《卓茂列传》说是“上党鲍宣”(第872页);卷八四《列女传》又说是“勃海鲍宣”(第2781页)。勃海着眼于原籍,上党根据著籍。

¹⁷ 徐溥撰、李东阳重修《明会典》卷一一《吏部十》分为民、军、医、儒、灶、僧、道、匠户八种(《天津阁四库全书》,第617册第119页)。各地不同,叶春及《石洞集》卷四《惠安政书二·版籍考》载为民、军、盐、匠、弓兵、铺兵、医等七种(《天津阁四库全书》,第1290册第290页)。《明史》卷七七《食货一》载:“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滨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第1878页)。各种记载大同而小异,所说均是就主要的户别而言,王毓铨在《明朝的配户当差》中,

归纳明朝户役为八十七种(《王毓铨史论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95—802页)。

18 如《明史》卷一四三《程通传》载:“尝上书太祖乞除其祖戎籍,词甚哀,竟获请”(第4056页)。黄瑜《双槐岁钞》卷四《恩宥军伍》记述了明宣宗恩宥鲁舆、李宗侃、徐琦三人,认为“此三事皆宣庙之仁也”(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1页)。倪元璐:《倪文贞奏疏》卷一一有《请免军籍疏》,被崇祯皇帝以:“军籍原属祖制,岂可以更易,不准行”而否定(《天津阁四库全书》,第1301册第407页)。

19 参见顾诚《谈明代的卫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彭勇《论明代州县军户制度——以嘉靖《商城县志》为例》(《中州学刊》2003年,第1期)。

20 冯梦龙《醒世恒言》卷二七《李玉英狱中讼冤》载:“你家又是卫籍,竟送他到官,这个衙门谁个敢来放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71页)。《清史稿》卷一二〇《食货一·户口田制》载:“其户之别,曰军,曰民,曰匠,曰灶”。又称:“凡民之著籍,其别有四:曰民籍;曰军籍,亦称卫籍;曰商籍;曰灶籍。其经理之也,必察其祖籍”(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480页)。

21 参见顾诚《谈明代的卫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22 如《明实录》中记载的双籍人物:王宸、张禴、王敞、杨维垣等,均不见于《明史》记载。再如《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壹》中收录明代墓志铭二百零六篇,其中有双籍人物墓志二十六篇,占所收总数的百分之十二点六,这些人也多不见于《明史》的记载。还有地方史志、家谱族谱、人物传记、明代登科录等文献中也记载有双籍人物,诸如此类的文献记载很多。

23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五〇《兵部尚书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31页)。卷六四《总督陕西三边都御史年表》作:“彭泽,湖广长沙人,陕西兰州卫籍”(第1194页)。均可证彭泽是双籍人物。

24 《弇山堂别集》卷五〇《兵部尚书表》(第930页)。军事编制与行政区划,有重叠者,也有不一致者,如吴世昌:“直隶常州府宜兴县人,山西平定州守御千户所官籍,直隶顺德府唐山小汪屯种”

(《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壹》,下册第165页)。乡贯、卫籍与屯种地分在三省之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一册《北直上·卫名同者》指出:“沈阳六:左、右二卫在京,中卫在辽东,中屯卫在河间府,右卫在和州,中护卫在山西潞安府”(《续修四库全书》,第595册第487页)。此类资料有助于理解王世贞的记载。

25 《明实录·明宪宗实录》卷一九四成化十五年九月庚辰(第26册第3432页)、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四一《程公事状》(《天津阁四库全书》,第1256册第706页)与焦竑《献徵录》卷四二《程公信墓志铭》(1727页)均载:“公还休宁里第”。

26 记载戚继光为定远人的,还有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一一《贺戚总戎平倭序》;黄道周《广名将传》卷二〇《戚继光传》;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七《南直隶凤阳府》;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一五《诰进阶昭毅将军上轻车都尉原任苏松参将彭公神道碑》等。

27 如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秦鸣雷《大参戎南塘戚公表功记》称:“公名继光,字汝谦,别号南塘,山东登州卫人”(碑今保存在浙江临海县东湖小瀛洲内);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载:“戚继光,登州卫人”(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4页)。登州卫人,是对戚继光卫籍的准确表达,其他登州、蓬莱等均是由此衍生出来的。

28 不仅戚继光自称蓬莱人,而且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一七三《登州府》亦载:“戚继光,蓬莱人”(《四部丛刊》续编,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26册第28页)。

29 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卷——《戚少保继光》载:“继光,字符敬,登州人”(《续修四库全书》,第1624册第40页)。

30 《四镇三关志》卷八《职官考·蓟镇职官·武阶·镇守总兵》载:“戚继光,山东人,左都督”(《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史部第10册第457页);《弇山堂别集》卷十一《公孤表·少保》亦载:“戚继光,山东人”(第760页)。

31 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一八有《少保山东戚公继光》诗(《天津阁四库全书》,第1294册第235页);卷二九《双剑篇》说:“少保定远戚公”,又说:“山东戚少保”(《天津阁四库全书》,第1294册第296页)。也是一种戚继光乡贯、卫籍双籍并存的说法。

参考文献:

- [1] 张廷玉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 戚祚国. 戚少保年谱著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 [3]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4] 贝琼. 清江诗集[M]. 天津阁四库全书[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5] 戚继光. 止止堂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 [6] 胡广利. 青龙满族自治县志[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
- [7] 李春宁. 河北长城游[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 [8] 秦皇岛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秦皇岛市志[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 [9] 尹小燕. 白羊峪口长城碑刻简析[J]. 文物春秋,1998,(2).
- [10] 康占忠. 抚宁县志[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 [11] 密云县志编纂委员会. 密云县志[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 [12] 田军民,肖波. 迁西县志[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13] 李子春,赵国英. 永旺塔与戚继光[J]. 文物春秋,2001,(6).
- [14] 刘震. 戚继光登舍身台诗碑[J]. 文物春秋,1994,(2).
- [15] 耿宗道,张训等. 临山卫志[M]. 中国方志丛书[Z]. 台北:文成出版社,1968.
- [16] 薛柱斗. 新校天津卫志[M]. 中国方志丛书[Z]. 台北:文成出版社,1968.
- [17] 阙名. 靖海卫志[M]. 中国方志丛书[Z]. 台北:文成出版社,1968.
- [18] 刘知幾. 浦起龙. 史通通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19]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0] 郑樵. 通志二十略[M]. 北京:中华书局,1995.
- [21] 陈傅良. 止斋先生文集[M]. 四部丛刊初编[Z]. 上海:上海书店,1985.
- [22] 王毓铨. 王毓铨史论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 [23] 丘濬. 大学衍义补[M]. 天津阁四库全书[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24] 徐溥,李东阳. 明会典[M]. 天津阁四库全书[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25] 柯劭忞. 新元史[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2.
- [26] 陈子龙. 明经世文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27] 黄瑜. 双槐岁钞[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28] 倪元璐. 倪文贞公奏疏[M]. 文津阁四库全书[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29] 沈登苗. 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J]. 历史地理, (20).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30] 何塘. 柏斋集[M]. 文津阁四库全书[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31] 张岱. 石匱室后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32]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明清史料辛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33] 焦竑. 献徵录[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7.
- [34] 陈洪谟. 继世纪闻[M]. 续修四库全书[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35] 孟繁峰, 刘超英. 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壹[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 [36] 海瑞. 海瑞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37] 李东阳. 怀麓堂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Z].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Research on the native home of Qi Jiguang

QIN Jia-cai

(School of History,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91, China)

Abstract: Whereas the native home of Qi Jiguang is not detailed in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different assumptions arise in both Ming, Qing dynasties and current time.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issue on basis of the archives and newly discoveries that his native home should be Penglai, Dingyuan, Fengyang of Shandong province. Qi Jiguang enjoys native home and household registry together.

Key words: Qi Jiguang; native; military; research

[责任编辑 周祖谦]